

<<中国大历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大历史>>

13位ISBN编号：9787108010360

10位ISBN编号：7108010364

出版时间：2007-2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黄仁宇

页数：31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中国大历史>>

前言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

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

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

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

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俑者。

宏观与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

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

我年轻时从军10年。

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

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

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

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

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

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

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场，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照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

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

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

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

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

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

“均徭”、“驿传”与“民壮”。

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一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

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

<<中国大历史>>

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干差。

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

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人为的平衡。

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

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

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

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谈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

”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

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

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

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

我和李公相处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

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桥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有布局。

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

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

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并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

《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

《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入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

我自己了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

1960年间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

全书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

至于本书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货志》。

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12篇。

虽然内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

<<中国大历史>>

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

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適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

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

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

当中若干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巨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

反之则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

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

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末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

虽然这线索摆在很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

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

最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私人方面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

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所以一经说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谈及古今中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毛泽东时，他恭维毛：“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观，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毛泽东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

况且历史从业员的工作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关于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

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

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意，而源于英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入这境界。

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

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turn - pi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

只因为日子久了，我们以为英国历来如此。

想像不到要将这样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奋斗。

本书有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西欧国家进入这境界的程序。

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

<<中国大历史>>

话说回头，8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虽有以上的愚见，还不敢申张，直到大陆上‘承包到户’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社不复成为生产的单位，情势确是不能逆转，才将本书结论作较肯定的说法写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几十年的筹谋思虑，那也就不能说我和出版者没有慎重将事了。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本书作者不是哥伦布，他没有发现新大陆。

可是他像一个普通船员一样随着哥伦布航行4次，亲历牙买加、洪都拉斯诸地，回到西班牙，说及确有一个新大陆的存在，听的人还说他在胡讲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烦了。

黄仁宇

1993年8月18日 纽普兹

<<中国大历史>>

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

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

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视野宏阔，见解独到。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中国大历史>>

作者简介

黄仁宇，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中国大历史>>

书籍目录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中国大历史>>

章节摘录

传统的中国历史家一向在褒贬品评人物，在临到秦始皇头上时则觉得题材之大，牵涉之多，不容易随便处置。

他的残酷无道达到离奇之境界，如何可以不受谴责？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工作，用这样长远的眼光设计，又用这样精到的手腕完成，又何能不加仰慕？一个思想周密的读者可能因秦始皇和他的随从的野蛮行径而感到困恼，可是在另一段文字里，又为他不断地努力企图实现他超过匹夫匹妇所敢于想像的计谋，甚至冒着无限的危险，不折不扣地执行而感动。

历史记载中的始皇，显示他虚荣心重，有时尚且行止古怪。

在当日一般情形之下，所述迷信的趋向很可能是事实。

史书中提及他有一次因风受阻而不能渡湘水，归罪湘君女神作祟，于是遣发3000囚徒，去砍伐山上的树木以资报复，可见得他在和超自然的力量作对，而不是震撼于超自然的力量。

他以黑色代表帝国之色彩也是超时代的独创。

从他所树碑文看来，他除了重视域内长久的和平之外，也极端注重性道德，认为与全民的休戚有关。

他有20多个儿子和至少10个女儿。

史籍上除了提及他多夫的母亲之外，对他一生有关的女子只字未提。

始皇帝游历极为广泛，他不仅履足于市廛，而且遍历名山大川，他曾在夜间微服巡行国都之内。

虽说始皇爱征伐，他却从未统帅三军。

此外他是一个不畏疲劳的工作者，他预定每天必须过目的竹筒，以重量作进度，不到目标不得休息。

在有关国家大计的场合他总先咨询下属，可是最后的决策，始终出于他本身。

可能最值得注意是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12年的时间，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

这是一个泱泱大国，前后遭兵燹几十载，而且追溯到以往的震荡局面，尚可以包括几百年。

他遗留下的位置，没有人能接替。

他刚一去世，丞相宦官和皇予以阴谋和政变彼此残害。

一年之内，全国各郡里揭竿而起的叛变不知凡几。

又3年后秦亡，始皇帝的亲人和重要的随从也全部丧生。

当朱瞻基在公元1435年去世时，大明帝国已不复可能由上端随意地操纵把持。

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并不把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

当朱元璋主持国政时，当日的社会尚在一种游动状态，可以由他以勤苦节俭的情调组织摆布。

他的农村政策，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尽量的避免干涉，所以其精神为简单节俭。

他的文官组织充其量也不过8000人，薪给之低，即依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特殊，因为朱元璋自己以农民而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为人民公仆，就必定要照字义上成为公仆。

在类似情形之下所有称为“吏”者，也另成一系统，尚且是官僚组织之下层。

多数的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如果他们有薪给的话，最多亦不过维持家室的食米而已。

这时候每一个村庄沿照朝廷的指示制定它的“乡约”。

又构筑“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村民之有善行及劣迹者，其姓名由父老查明公布。

此外，村民因为遗传、婚姻、财产交割，及殴斗而发生纠纷者，也由父老在这两座建筑物前评判分解。

。

每当农历正月及十月，一年两次，各地方主持“乡饮”，所有的人户都要参加。

在分配饮食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和批评乡民不守规则行为之各种节目，如果有劣行的乡民规避被指责的程序，则由全体与会者指摘其为“顽民”，按情节可呈明政府，充军边疆。

这样一来，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职责都已经在乡村中实施兑现，于是官僚即可以在城垣内执行他们的任务。

在朱元璋的时代，所有官僚除非特准，否则不许下乡，如有擅自下乡的，可以以“扰民”论罪，判处死刑。

<<中国大历史>>

经过70年之后，以上各种法制规章大致已被时代淘汰而不复生效。

文官组织已经一再扩大，其员额超过当日2倍而成长至3倍。

一般官僚生活舒适，即使名义上的薪给如旧，他们已有各项半合法的额外收入。

当初的14,341殷实的户口此时已无人提及。

他们已被“缙绅”阶级替代，西方的学者照英国习俗称之为gentry。

这缙绅阶级包括所有文职官员和他们家庭中的成员，并及于监生贡生和捐资纳监的人物，他们由政府准予“冠带荣身”，人数远较朝代草创期间为多，可是最多时仍不及全国人口百分之二。

并且也只在朝代末年，土地已有相当的集中，捐资纳监的泛滥，才有这程度。

切实的数字无法获得，只是我翻阅过一大堆各地方志、传记、官方文件等等，约略估计可能有25万户各拥有田地200亩(约强于30英亩)至2500亩(稍强于400英亩)之间，而且下端的户数远较上端的为多，超过以上资产之户数则极稀少。

这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

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个优秀分子集团的成员又因为社会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动性不时更换。

一般因为科举考试的成败，影响到一家一室之兴衰，如此也替这集团觅得新人物而淘汰旧户室。

明朝之后又继之以清朝，这种组织及其功能在中国近代史里发挥而为一种稳定局面之因素。

可是积习所至，也在20世纪的中国需要改造社会时，成为一种切实的障碍。

官僚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

后者从不平衡的情形而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

明朝的税收制度也是一大阻碍力量。

简单说来，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又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过来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采收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溃。

可是演变至此，要想改造这制度的机会业已一去而不复返，如果要构成经济上更为有效的组织，则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如是则整个文官集团都要重新训练，更用不着说要组织银行培养带服务性质的事业了。

可是事实上，这时候明朝政府手中所掌握到货币工具，即令维持现状，仍属牵强。

虽有朱瞻基和夏元吉的方案，纸币还是因为印刷过多，逐渐被人拒绝使用。

这弊病还要追究到元朝上面去，自先朝滥发纸币，即忽略了制造铜钱，这五铢钱是中国传统卜民间交易下至乡村的媒介，及至白银大量输入于中国，民间即用碎银作为交换工具，流通既久，明政府不仅无法禁止私人交易之用银，连它自己的财政单位也逐渐地以银为本位，于是政府对货币整个的失控，既不知道使用货币的数量，更谈不上接济操纵其流通了。

明政府与自然经济的力量分离，是它行政上的特色之一。

其衙门机关既缺乏在业务上增加活动范围的力量，也只好强调儒教的意识形态，而且其施用政治上的威权也愈来愈过火了。

在许多情形之下，这政治威权带着负性格，而甚至影响到皇帝之使用特权。

皇帝可以处罚任何官僚或一群的官僚，可是他极难提拔一个亲信或者令之任要职，他可以在现行法令之中批准例外情事，可是他没有权力推行新法影响到全国。

如果在皇帝的龙椅上宣布御旨，要不是一种仪礼上之做作，即是追认某项既成事实。

这可不是说明朝的历史读来只是干燥无味，相反的，这相持不下的局面内产生无数的纵横曲折，包括了各种阴谋巧计。

只是读者如不具备若干基本知识，则可能在这各种花样之中迷惑，也不能分辨何者为重要，何者不重要，何者为离奇古怪的矫情造作，何者为真精神好汉性格。

读者不要忘记当本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共和国兴起时，明代史即曾被用作一种武器，为宣传专家抛掷来去。

<<中国大历史>>

1858年夏，英法美俄军舰集结于天津附近海岸。

前二者采取军事行动，后二者在近距离观望。

大沽炮台被攻下，天津被占领。

所谓天津条约签署于6月，实际上包括4种条约。

这些条约一般的让各国派遣使节驻在北京，关税值百抽五，转口税2.5%，此外指名将内地口岸通商，于是所有的内地省份，包括台湾和海南岛，中国承认外国船只可航行于内河。

这数国持有护照之公民得自由来往内地。

在中英条约上，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

中国向英法赔偿军费。

以上条约，彼此政府批准互相交换缮本之后生效。

次年，外国军舰准备执行交换，抵达塘沽海岸时大沽炮台正在修理，海河至天津一段设有障碍。

只有美国公使接受中国官员之指示由陆路入京，交换缮本，虽说中国方面之接待缺乏友好态度。

俄国使节原由陆路来华，也交换如仪。

英法公使率领船舰18只，决心扫除河中障碍，与炮台上新炮位互相开火冲突。

中国方面之部队由蒙古将领僧格林沁指挥，英舰4沉6伤，死伤四百余人，可是到头中国仍须赔偿损失。

1860年英军18000人与法军7000人，又在华南雇得中国苦力2500人担任后勤，由陆路侧背攻击大沽后占领天津。

途中和议耽搁了联军的进展，但是在10月他们已进占北京。

咸丰皇帝逃往热河，死在行宫。

圆明园为皇帝夏季离宫，去今日之北京大学不远，首先被联军掠夺，次由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下令焚毁。

1860年之中英中法条约由咸丰之弟恭亲王奕訢出面签字，承认1858年之条约有效，将九龙割让与英，并承认法国教士有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的权利。

在连串事件之中得到最大收获者为沙皇统治下的俄国。

俄国领使自称有劝说英法军离京之功，要求并获得黑龙江省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包括今日之海参崴(Vladivostok)及伯力(Khabarovsk)，虽说在中国内忧外患无力支顾期间俄人已进入该处空旷地区戡界筑屋，并威胁中国地方官接受其主权。

此间所辖土地逾30万英里，1860年之中俄条约只算承认既成事实，又扩大范围。

.....

<<中国大历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

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

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

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

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俑者。

宏观与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

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

我年轻时从军10年。

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

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

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

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

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

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

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场，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量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

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

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

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

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

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

“均徭”、“驿传”与“民壮”。

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一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

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

<<中国大历史>>

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干差。

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

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人为的平衡。

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

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

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

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谈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

”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

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

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

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

我和李公相处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

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有布局。

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

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

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并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

《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

《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入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

我自己了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

1960年间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

全书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

至于本书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货志》。

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12篇。

虽然内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

<<中国大历史>>

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

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適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

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

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

当中若干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巨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

反之则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

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

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末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

虽然这线索摆在很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

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

最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私人方面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

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所以一经说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谈及古今中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毛泽东时，他恭维毛：“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观，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毛泽东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

况且历史从业员的工作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关于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

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

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意，而源于英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入这境界。

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

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turn - pi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

只因为日子久了，我们以为英国历来如此。

想像不到要将这样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奋斗。

本书有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西欧国家进入这境界的程序。

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

<<中国大历史>>

话说回头，8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虽有以上的愚见，还不敢申张，直到大陆上‘承包到户’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社不复成为生产的单位，情势确是不能逆转，才将本书结论作较肯定的说法写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几十年的筹谋思虑，那也就不能说我和出版者没有慎重将事了。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本书作者不是哥伦布，他没有发现新大陆。

可是他像一个普通船员一样随着哥伦布航行4次，亲历牙买加、洪都拉斯诸地，回到西班牙，说及确有一个新大陆的存在，听的人还说他在胡讲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烦了。

黄仁宇

1993年8月18日 纽普兹

编辑推荐

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每一部都那么炙手可热。历史书有很多，黄仁宇的书让读者读得很轻松，感觉很新鲜。

这也许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称作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听刘心武解密“红楼”疑云;随“百家讲坛”破解“清十二帝疑案”;考古中国、揭秘中国、探索发现……央视10套权威纪录片全收录,别错过!

<<中国大历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